

論語版本源流考析

昌彼得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中國古籍中傳佈最廣，影響最深遠，後代論著注釋最多的，殆無過於論語一書。不僅在中國本土，就是在日本、韓國以及東亞各民族中國文化蔽及的地方，都受到了它的影響。因為其書傳世久遠，各種版本的文字發生了差異，也因此原因，加上各時代學風的趨向，後代的注釋講解也就有了不同。本文僅就傳世之版本，區為輯佚，白文，疏注劄記，日韓學者著作四類，各條述其版本以及釋注的源流演變。最後殿以結語，介紹錢穆所著的論語新解，為歷代注釋本的總結。

中國古籍中傳播最廣，影響最深遠、後代論著釋注最多的，殆無過於論語一書。不僅在中國本土，就是在日本、韓國以及東亞各民族中國文化蔽及的地方，大都受到它的影響。「論語」一書是孔子的學生、或學生的門弟子，將他們直接或間接聞知孔子的言行事項各自記載下來，再經過彙整編輯而成的。因為孔子的生活言行，平易切近人生，他所講的孝悌仁恕，是建立社會秩序的基本法則，沒有老莊學說的虛玄，更沒有西方哲學家們的一套曲折精緻成為系統的抽象意識，所以能獲得人民的共鳴，為歷代所重視，甚至日本的學者贊譽論語是「宇宙第一寶典」（石川之聚序天保本論語集解）。

在漢代、論語與孝經小學同等重視，古人六歲入學即讀論語，而後再研讀五經，論語是進德修業的門階。西漢文帝時將論語列入學官，設立博士以造就師資，自唐以來的科舉制度，論語是必考的科目之一，直到現代，台灣將論語編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為中學生必修的課程，所以論語是中國人甚至東方各民族耳熟能詳的一部書。

當這部書在中國經過多年的演變有了定本以後，東傳到韓國，再經由三韓的百濟博士王仁，在晉武帝太康八年（二八

七），攜帶論語十卷到日本，獻給當時的應神天皇，此後論語一書在日本生根孳長，而中國以後有關論語的各種注釋本也陸續的傳到日本，故日本現今頗存古本，日本學者有關論語的著作也很多。而朝鮮大概因戰亂的緣故，現存藏的古本甚罕，不過宋明以後的中國論語著作，則韓國翻刻翻印的倒有不少。

論語自編定後，經過了二三百年的傳授，輾轉傳錄，文字與章句篇第發生了差異，經師們也各依據他們的藏本來句讀訓解，而形成了不同的學派，西漢初年有齊、魯、古三家之分。再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到了成帝時有河內人張禹，他初習魯論，後又習齊論，於是他揉合兩派的本子，擇善而從，他所訂定的論語本子，世稱張侯論，又因他所釐定的篇章，係因襲魯論二十篇，故也可稱為新本魯論。張禹曾教過成帝，所以他編的論語為學者所宗，這是論語經過幾百年分家後第一次的揉合。到了東漢末季有經學大師鄭玄就張禹論語的章句，用魯論、古論來校定，並為之作注，於是魯論又與古論語相匯合了。熹平四年（一七五）詔令校正經書的文字，雕刻於石碑，豎立於首都洛陽太學門外，作為定本，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其中論語應是用列在學官的張侯論為底本再經過校訂刊刻的，這也是現傳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的祖本。

從熹平刻石始，迄今已有一千八百餘年，論語的版本文字又因輾轉抄錄傳刻而有異同，歷代的學者致力於此書，或闡發義理、或校刊文字，或作名物訓詁之考證，僅就傳世見於著錄的各類著作不下數百種，每書的版本少則三兩種，多者十來種，可謂琳琅滿目。筆者不才，謹就知見，將中國日本韓國所傳存之本，條理出論語一書的源流嬗變，分別概述，聊供欲治論語者之參考。

一、古章句疏注輯佚

按隋書經籍志論語類著錄了二十六種，又附載梁代有而隋代已佚的，又有三十四部；新唐志中著錄唐人的論語著作有四家。而唐代以前的六十四種著作，現今僅有何晏、皇侃兩家傳存下來，甚餘的六十二家原書都佚傳了。清人輯佚的功夫下得很深，從唐以前的著作中輯出了不少佚傳的古籍，雖不能頓還舊觀，但仍可藉窺古書的一鱗半爪，有資於校勘，茲酌舉於下：

古論語十卷 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本。古論語是西漢景帝與古文尚書同時出於孔子老屋，經典釋文叙錄引桓譚新論謂古論文字與魯論不同者有四百餘字。

齊論語一卷 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本。按漢書藝文志班固注多「問王」、「知道」二篇。又按魏何晏集解序說：其餘二十篇中的章句頗多於魯論。馬氏採禮記聘義及王制篇孔穎達正義補所佚「問王」（即問玉）、「知道」二篇，乃意必之說，猶有待考訂。

論語孔氏訓解十一卷 漢孔安國撰 有清馬國翰玉函山房、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及近人龍璋小學蒐佚下編補三家輯本。

安昌侯論語一卷 清馬國翰玉函山房本，蒐張禹論語的佚文。

論語馬氏訓說二卷 後漢馬融撰 有馬國翰、龍璋兩家輯本。

論語何氏注一卷 後漢何休撰 有馬、龍兩家輯本。

論語鄭氏注十卷 後漢鄭玄撰，此書見於隋唐志著錄，大抵亡於唐末五代之際，敦煌石室中發現有唐代寫殘卷兩卷；一為龍紀二年（八九〇）寫本，殘存卷二起述而第七至鄉黨第十，首殘，羅振玉影印入鳴沙石室佚書初編；一為子路篇第十三的殘卷，影印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鄭註論語，宋代有王應麟輯本二卷，有碧琳瑯館、芋園兩叢書本。清代以來有王謨漢魏遺書鈔、袁鈞鄭氏遺書、宋翔鳳浮谿精舍叢書、孔廣林通德遺書所見錄、黃奭漢學堂叢書、及馬國翰、王仁俊、龍璋等八家輯本。

論語包氏章句二卷 後漢包咸撰 有馬國翰、王仁俊、龍璋三家輯本。

除上舉諸家外，馬國翰又輯漢魏六朝諸家注本卅二家，俱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以非名家，不一一列舉。

二 白文本

熹平石經論語殘石 熹平石經是東漢靈帝時政府公佈的經書定本，將七部經典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豎立於太學門外，以供全

國讀書人抄錄或校勘。石碑雖豎立於光和六年（一八三），但蔡邕等奉詔校定在熹平四年，故世稱熹平石經，其中的論語凡石三塊。後代經過戰亂，石碑已殘碎流失，宋代發現了若干殘碑，南宋初洪适將所見的論語殘碑文字，著錄在他所撰的隸釋一書的卷十四中，共得九百七十一字，皆前後各四篇的經文。後代又陸續有零星殘石發現，近人馬衡收入漢石經集存，共得殘字三百九十七，合之洪适所錄共一千三百六十八字。按熹平石經論語，據洪适所錄篇末有「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字」，而今所能考者尚不足十分之一。洪适謂：「以今所行版本校之，亦不至甚異」。而馬衡則云：「以今本校之，異文特多，字數時有盈絀」，可覘自宋以後論語經文的文字，頗有差異。

開成石經論語十卷 唐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雕刻九經三傳竣工，原立石於長安國子監兩廊，宋元祐中遷到西安府學，石經現尚存，唯文字稍有殘泐。民國十五年張宗昌氏詎忍堂曾將之摹刻印行，殘字也經雙鈎復原。論語經文係用何晏集解本，惟未刻注文耳。開成石經是中國後代流傳論語正文的主本源頭。

宋刊小字本論語二卷 此為宋刻小字巾箱本九經之一，民國十五年張氏涉園曾予影印，又明代亦曾多次翻刻。

日本古鈔卷子十卷 是日本右大臣菅公於醍醐天皇昌泰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西元八九九）手寫本，天保八年（一八三七）津藩有造館曾予摹刻，清代傅雲龍又據有造館本覆刻入纂喜廬叢書中，此本是後代日本流傳論語經文的祖本。

日本天文版論語十卷 此本亦出菅公手寫本，但改變了原卷子的行款，初刻於後奈良天皇天文二年（一五三三），後代有覆刻本。

論語古訓正文二卷 日本太宰純撰。按太宰氏撰有論語古訓十卷，又別取經文，用片假名音注，以教學童，由其子太宰定保校訂，刻於寶曆四年（一七五四）。

論語諺解四卷 此本係朝鮮宣祖命以諺文音註論語，以教韓國生徒。

滿文論語二卷 此係清乾隆皇帝敕命翻譯滿文四書之一，武英殿曾予雕印。

篆文論語一卷 今傳有清康熙間張照奉敕校刊內府本及光緒間刊吳大徵篆書本。

按論語經文今傳世之本，大抵分為兩大系統，中國的版本係出之開成石經及宋版，而日本的傳本係本之皇侃義疏及菅公

寫卷子本，故兩者文字頗有異同盈絀。清末黎庶昌曾取國內本校日本有造館本，異同多達三百餘字，撰有校記。又葉德輝取日本天文版以校傳本，亦得異同三百餘事，撰為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一卷。又清馮登府有異文考證，張漪有異文集覽，可考見各本異同。

三、疏注刑劄本

自唐宋以來關於論語一書之疏注考訂著作，或單行，或併入四書中，存世可考者不下數百種，而近代有關之論文散見學術刊物者尚不預焉。茲僅能酌擇若干重要典籍予以概述，以覘研著論語一書源流演變之大勢。

今傳注解本以魏何晏論語集解十卷為最古。此書南北兩宋國子監及南宋廖瑩中世綵堂均曾刊印，唯今已不傳。存世可考者以元代岳氏荆谿家塾及江西盱郡刊本為最早，岳氏刊本係翻宋監本，盱郡則覆廖氏世綵堂本，兩元本後代並有翻刻或影印本。日本所藏何晏集解以正平本為最古，刊刻時代較元岳氏、盱郡兩本稍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即據其本覆刻或影印。另外敦煌所出有唐寫殘卷，殘存微子第十八至堯曰第二十，首尾復有殘缺，此殘卷已影印入敦煌祕笈留真新編中。其次為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此書見於隋、唐、宋志及宋秘書總目著錄，知在北宋猶存。真宗咸平中邢昺奉詔撰成正義，交國子監雕版，頒列學官，皇疏即不流行，大概亡於南北宋之際。清乾隆間再由日本傳入中國，收入四庫全書，內府並刊印以廣其傳，吳騫撰皇疏參訂，桂文燦撰皇侃考證，今俱有傳本。又敦煌祕笈留真新編中收唐寫殘皇疏本一卷，僅存首四篇而首尾有殘缺。

論語正義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邢昺的正義，宋代國子監曾刊行，今已無傳本，僅見於注疏合刻本。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本為注疏合刻的第一本，今亦僅殘存後十卷。完本以宋元之際建刊十行本為最早，後來如明李元陽、北京國子監、毛氏汲古閣、清武英殿皆輾轉翻刻，近代通行則以阮元南昌學府本最佳。

論語筆解二卷，唐韓愈撰。愈有論語注十卷，見新唐志著錄，已佚。此筆解非全解，殆後人於其稿本中採輯其注所未載的資料別錄成二卷，此書今傳有宋代蜀刻本，明代刻本，及日本校刊本。

論語全解十卷，宋陳祥道撰。陳氏長於禮，故注釋論語，於禮制最為明晰。其書後代未見刊刻，傳者率皆抄本，清四庫全書收之。近年藝文印者館出版論語集成，始將之排印。

論語集註十卷，宋朱熹撰，朱子於論語一書用力至深，初撰精義，取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家之說，薈萃條疏編為論語精義十卷。其後於其中再採擷精華，撰成集註。於各家有所異同疑似之處，必須加剖析說明者，乃別著「論語或問」二十卷。自集註、或問書成，初撰的精義乃成糟粕，故後代遂鮮流傳，僅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及後代所編「朱子遺書」收之。集註則流傳最廣，傳本甚多，今傳世最早的刻本是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馬光祖所雕印的四書集註本。其本在元至正間上虞泳澤書院及清初內府均曾覆刻。又宋末別刻七行大字本，今亦存世。明清兩代及日本、韓國皆曾多次翻刻。或問一書的流傳則遠不如集註普遍，除了四庫全書著錄外，僅有朱子遺書及西京清麓叢書、唐石經館叢書諸叢刻本。朱子關於論語的著作，在朱子語類卷十九至卷五十有「說論語」多達卅二卷，可供研究朱子集註撰定的過程。

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拭撰。此書撰成於乾道癸巳九年，所以以癸巳名其書。四庫全書著錄，通行的版本有通志堂經解、學津討原等叢刻本。張拭與朱子友善，在朱子大全集中備載他與張拭商討論語的函札，多至一百一十八通，他的集註中頗採有張拭的解說。

自朱熹論語集註出版，因為他闡釋書的義理，平易明白，遂為後來的學者所宗仰。較朱子稍後的南宋大儒真德秀，今傳有其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其中論語十卷。真氏生前僅撰成大學、中庸兩書，關於論語、孟子僅加點校，並未成書。今傳的四書集編乃是宋末劉存依據真氏西山讀書記以及真氏其他遺著與文集、大學衍義等書採輯編成。因朱子集註論語，與先儒的解釋多有不同，他如何取捨的道理，多散見於或問、文集、語錄中。而或問、語錄、文集中所載的，多屬未定之說，其解釋與集注難免互有乖異的地方，使讀者難明就裡，感到無所適從。真氏的論語集編十卷，即是博採朱子之說以相發明，並附以己見，來折衷其乖異之處，使讀集註者不致有所困惑。

自真氏以後，繼之撰述論語者，宋末有蔡節論語集說、趙順孫論語纂疏、趙應論語箋義。蔡節的集說、四庫著錄十三卷，

朱氏經義考載二十四卷，今傳宋淳祐刻本則分十卷。蔡氏說論說，大旨亦從朱子集註，一般而論，其采朱子之說，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賅。偶有背朱子而采鄭汝諧論語意原來解釋的，則不免牽強穿鑿，反而不中理。趙順孫的纂疏亦十卷，有志堂經解本，也是以朱子之說為主，並旁引宋黃幹、輔廣以下至真德秀、蔡節等十三家，這十三家皆宗朱子者，引其說為之疏解，故以纂疏名其書。趙惠的箋義三卷，有守山閣叢書本，則是將朱子的集註中，所載的一言一事，各詳考其本原，箋釋於下，俾讀朱子書者，對於朱氏意旨可以豁然通曉。

在宋末於朱子最有功者，厥為金履祥的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因為朱子集註，主要在證明孔子的理道，對於論語書中所載的事跡名物典故，大率沿襲舊說，未遑詳核，所以註說不免有誤。金氏此書將朱子的集註，拾遺補闕，凡事跡名物典故，多加以分辨，來彌縫朱註的疏失。

朱子的集註傳到北方金國，金國的學者王若虛撰有論語辨惑五卷，其書無單行本，收在其滹南遺老集卷三至卷七。其書雜引先儒解釋的異同，再斷以己意。他對於朱子解釋當否，發生懷疑者固有之，但從朱子之說者亦不少。元代陳天祥亦屬北方學者，他所撰的四書辨疑十五卷，其中辨論語之疑凡一百七十三條，大抵多宗王若虛之說。

元仁宗延祐初科舉取士，考四書主用朱子的集註，明代沿之不改，故元至明代中葉以前有關論語的著作，率遵朱子之說，罕有違之者。元有許謙撰論語叢說三卷，其書發明朱子之學，於集註旁引曲證，疏通說明，他不苟異，但也不苟同，將朱註未及改舊註的誤處，而予以更正之。也是有功於朱子的學者。此書四庫未收，阮元得影元抄本進呈，置之宛委別藏，故宮博物院將之影印流傳。

又有胡炳文撰論語通十卷。其書是因為趙順孫的纂疏、吳真子的集成（已佚）兩書，雖說是闡釋朱子的緒論，但尚有與朱子之說乖戾者，胡氏依據此二書重為刊削，再附以己說而成此書。至於趙吳二氏異於朱子之說是否合於經義，他不予討論，完全以是否合於朱註之義來定其是非，可以說是恪遵考亭之學者。他同時稍後的張存中撰論語通證二卷，則係刪削北方學者杜瑛的論語旁通二卷及薛延年的四書引證二書（今皆佚）而成，附於胡氏論語通之後而行，以顯示朱子集註用事之審，今傳有通志堂經解本。而詹道傳撰論語集註纂箋十卷，更是對朱子曲為迴護。如論語公冶長篇第五，載子貢問孔子，他是何

器？孔子答曰：「瑚璉也」。朱子註瑚璉，本來誤引了包咸的舊註：「夏曰瑚，商曰璉」，未加深考，本來註解錯了，但元代宗朱子的學者都不敢斥其非是。詹氏纂箋至此，既引明堂位「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來辨其異同，不遑指出朱子之誤，反而謂「夏曰瑚、殷曰璉」係出之爾雅釋器，來掩飾朱子之誤。實則爾雅並無此文，乃詹氏杜撰以迴護。元代篤守朱子之學者，疏解論語多類此。

明初胡廣撰論語大全二十卷，係依據元倪士毅的輯釋增刪而成，為科舉而作，朝廷頒之學官，以為程式。弘治正德間蔡清著論語蒙引四卷，考集註之本末，析大全之異同，也是供舉業用書。嘉靖中林希元四書存疑中之論語存疑四卷，即推原蒙引的意旨，再擴而充之。呂柟著論語因問二卷，不作訓詁解釋，藉他的門弟子口中質問的話，將孔子的言行，用他親身所體驗躬行，見諸實事來加以解釋，讀來特別感到親切。萬曆間有張居正的論語直解二十卷，這是他任經筵講官，為神宗進講的講義，解釋得明白易懂，其大旨也不出朱子集註的範圍。此書舊罕刻本，近年台北藝文印書館所出版的論語集成，始根據桐城姚永樸節抄本排印。

明隆慶萬曆以後，姚江之學盛行，學者講論語，固然也有羽翼朱子的，如章一陽的四書正學淵源。但大都立意與朱子異。如周宗建的論語商二卷、劉宗周的論語學案十卷，此二人皆出於姚江之學，疏解論語，不免雜以陸王心性之說，至於應慎的四書酌言、王肯堂的論語義府，更以狂禪來說論語。王氏的論語義府二十卷，不列經文，但標章目歷引宋元時諸家的講義，雖也偶采唐以前人的舊說，但為量無多，凡采舊說與朱子集註兩歧者，則低一格錄之，其體例看似遵朱子，實際其說雜於釋。而萬曆間的藕益大師智旭撰論語點晴二卷，且以佛家的因果輪迴之說來釋論語。

明代有關論語的著作，而不用疏釋的方式，但對於讀論語者實有所裨益的，則有嘉靖中陳士元論語類考及李枋論語外編二書。陳氏論語類考二十卷，係略遵宋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之例，專考論語書中的名物典故，將名物分為十八門、四百九十多目，每一名目，先列舊說及朱子的釋註，再蒐討群書互相參訂，則以「元案」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說，悉予糾正。雜引朱註，但並不苟同集註，不像元儒為朱子諱。此書四庫全書已著錄。至於李氏的論語外編凡十八卷，他以論語係記孔子的言行，而在論語以外的經子書中，時有「子曰」、「子云」、「子言之」之文，於是採擷禮記、大戴禮、孔子家語、春秋三傳

……以及莊列荀諸子之書凡五十種，將孔子所言輯出，分為十八門、以類編輯，各註出處，始論學以迄聖蹟，最後附以孔子弟子言行，來羽翼論語，故稱外編。此書四書未收，今傳有明萬曆南昌府刻本。

清代學者治論語者甚多，清史志中所著錄不下八十餘家，至於合解四書者更多達二百餘種。這眾多治四書論語學者的著作中，大別可以區為兩大派，一派是尊漢學抑宋學，甚或專以攻駁朱子的集註，一派是維護朱子再予發明。尊漢學者重視名物訓話與考據，清初有王夫之。王氏著有論語稗疏一卷、論語訓義二十卷、論語箋解不分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其解論語考核典故，兼發揮理蘊，頗糾朱子之誤。與王氏同時者有毛奇齡，著四書改錯二十二卷、論語稽求編七卷（此係毛西河全集本，四庫全書本分四卷）。所謂改錯者，專糾朱子之錯。因毛氏之文，遣辭尖厲，雜以謾罵，頗招致宗宋學者群相駁斥，如乾隆間戴大昌著駁四書改錯二十一卷，專針對毛氏，予以反駁。光緒間有楊希閔撰四書改錯平十四卷，也是對於毛氏的駁議，不過他也完全迴護朱子集註，所以名其書曰平。毛氏之後，有李塨作論語傳註二卷。此書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因其學出於顏元，以實用為主，對於程朱的講習，一概謂之空談。乾嘉間有程廷祚著論語說四卷、何綸錦撰論語直解四卷，此二書則是引舊說以正朱子集註。同時又有馬時芳撰論語義疏二十卷，及其弟子馮安常撰論語集說八卷，不過此二家之批評朱子，則是宗陸象山、王陽明心性之學的觀點來闡發論語的義理，因而力訾程朱。又有凌鳴喈撰論語解義二十卷，則是尊漢學誣宋學，貶責宋儒，最為激厲。

清代糾正朱註的固多，然而推尊朱子者仍不乏其人。如刁包的論語翊註二十卷、呂留良的論語講義二十卷、陸隴其的四書因勉錄卅七卷、松陽講義十二卷、王鏊的論語釋注不分卷、王揆的朱註發明十九卷、張謙宜的四書廣註卅六卷、梁章鉅的論語旁證二十卷、張甄陶的四書翼註論文卅八卷等等，皆於朱註論語的精髓處予以闡揚發明。呂氏的四書講義，批選時文講解四書，多從朱子的觀點來發揮，本無違當時的科舉制度，然而因曾靜一案被株連，此書遂遭禁燬。雍正皇帝並命朱軾等將呂氏講義中凡議論悖謬，引據舛議之偽，一一考究原委，詳加駁斥，欽定成「駁呂留良四書講義」八卷，並由武英殿雕印發行。但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並未著錄此欽定之書，也未列於存目，大概乾隆帝感到所駁斥者，尚不足以勝過原書，所以此書後代流傳甚罕。

清人治論語除了環繞朱註外，亦有專輯古義來疏解論語者，如乾嘉間陳鱣撰論語古訓十卷。陳氏以邢昺本集解多舛謬，甚至將語助字刪削，致使文義不屬，乃採唐以前諸書中所引漢儒鄭玄、馬融、王肅、包氏之說，為之疏解，所以鄭說特多，其意在存漢代經師之遺義。繼之而作者，有梁廷桢論語古解十卷、潘維城論語古註集箋十卷。梁氏書取漢至唐三十餘家之說，摘與朱子集註異者，依次排纂而成，然所輯未能完備，間加的按語，亦復膚淺，遠不如陳氏書之有條理。潘氏之書亦是就集解本刪去孔安國、何晏之說，而補輯鄭玄註語，並采漢魏古義及近儒之說為之箋，其意亦在尊重漢儒，只是箋中廣引劉逢祿、宋翔鳳之說，未免雜亂。

清人亦有專考論語本經文字之異同者，今通行之本，如唐陸德明之釋文、皇侃義疏、邢昺正義雖同出何晏集解本，而文字各有異同，亦與開成石經不盡相合，至於日本本、高麗本，因傳授各別，其轉寫譌互，更不可勝舉。至於漢魏以來，經史傳注，子家文集，其所徵引，每有增損竄易，使考古者目迷五色，無所折衷。乾隆間有翟灝撰論語考異二十卷，博采各本文字異同，為之疏證。嘉道間有馮登府撰論語異文考證十卷、博蒐汎采，自本書流傳古本之外，更參之群經子史、旁及唐宋文集、金石碑刻，以迄近儒顧炎武、毛奇齡、何焯、錢大昕諸家之說，凡一字之歧，靡不考訂精審，其核核更在翟灝考異之上，可以通古訓，廣異聞。

清代學者解論語者，以清末劉寶楠所撰的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最為富瞻。清人解論語，或詳於訓詁考據，以糾朱子之失；或闡明義理以為朱子之羽翼，劉氏此書，考據訓詁校勘以及發明義理並重，最稱博洽。

自論語成書，歷時二千餘年，後代疏注者甚多，然未有對其書有所致疑者。清乾隆間有崔述者，著考信錄卅六卷，於古史經書皆有所疑。其中洙泗考信錄四卷，則對論語的內容頗予懷疑，認為今傳本論語係出自張禹所校正，張禹媚王莽而取富貴，其人品殊不足道，因懷疑張氏於原本論語有不當刪而刪者，有不當采而采者，必非論語纂定時的原本。他復撰論語餘說一卷，其中「篇章致疑」篇，謂論語的末四篇——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可疑的章節頗多，前十五篇各篇篇末的各章，亦多可疑之處，合而計之，有：

事實不可信者六章二節

事實可疑者六章

義無可疑而文體不類者九章

文體大可疑者二章

門人於孔子前稱夫子，而事亦可疑者二章

事無可疑，而在篇末，與篇中文不類或有缺者五章。以上都凡三十章二節，佔全書四百九十八章約十五分之一。所列舉雖未必可以盡信，然亦有值得供學者省思之處，可資深入研究。

四 日本韓國學者論語著作

自從論語一書傳到日本後，遂在日本生根並孳長，流傳甚廣，輾轉傳抄翻刻者頗多，以故日本存世的論語古本不少。僅就光緒年間楊守敬氏在日本購獲，其中一部分今歸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論語白文、何晏集解、皇侃義疏等古本就多達二十五部，其中最早的有觀應元年（一三五〇）抄卷子改摺裝本，其次十五世紀室町時代的抄本有八部之多，稍次十六世紀的抄本也有多部。因為日本所藏的古本多，若干日本學者在論語校勘方面貢獻比較大。僅就筆者知見所及，有山井鼎、物觀用足利學校所藏的古抄本及活字版校汲古閣本，成論語考文補遺十卷。吉田漢官用古今本六種校慶長本何晏集解，而成考異十卷。市野光彥覆刻他家藏正平版論語集解，並參以山井鼎之考文、吉田氏的考異，錄其涉文義資考證者若干條，成論語札記一卷，刻附正平本之後。武內義雄以文明九年（一四七七）抄本皇侃義疏為底本，取九種舊鈔本校勘，並采吉田的考異、市野氏正平本論記札記二書中所引皇侃疏參校，而成論語皇疏校勘記一卷。豬飼彥博亦廣採古本，校論語正文之異同，於朱子集註已考正則略之，成論語考文一卷。

在疏解注釋方面，東瀛的學風也與中國信息相通，有篤守朱子之學的，如伊藤維楨的論語古義十卷、中井積德的論語逢原二十卷、豐島幹的論語新註四卷、岡田欽的論語劄記（七經劄記之一）一卷等等。而伊藤馨撰論語序說考一卷，則疏釋朱子的序說。亦有用陸王心性之學來釋論語如明代劉宗周者，則有佐藤坦的論語欄外書二卷。宗朱子之學者源元備著論語駁異

一卷，則專駁斥該書。也有批駁宋儒，解論語力創新意如王夫之、毛奇齡者，如物茂鄉的論語徵十卷、東條弘的論語知言十卷、廣瀨建的讀論語一卷等。物茂鄉解論語，皆徵諸古註，推演其義，於宋儒之說，多所駁詰。其說似受漢學家的影響，然所詮釋，主于訓義，而不考究乎文字音韻訓詁，則又未能嚴守漢學的壁壘，故隙罅百出，其後岡白駒著論語徵批一卷，則專批駁其不安之處。此外有伊東龜年撰論語筆解考二卷，伊東氏以韓愈所見經文與皇疏、邢疏及朱子集註或殊，詳揭其異同而考訂之，凡考訂今本之譌者廿二字，刪者十字，而補者九字。至於仿清乾嘉學者在訓詁考據上用力者，則有安井息軒所撰的論語集說十卷。

韓國學者有關論語之作，筆者所知甚罕，僅見漢城大學奎章閣藏有丁若鏞著論書手劄三卷，抄本，殆未曾付刊。其書不釋全經，但於論語各節中有疑義者，則分別揭出，首列諸家之說，附加案語駁論，徵引考證，頗稱明確，持論亦時多卓見。

五 結語

自何晏邢昺疏注論語之後，歷代論著者雖多，而影響深遠，既久且鉅，無過於朱熹的集註。因為他闡釋孔門做人的道理，剴切明白，平易近人，比較容易瞭解。固然他的疏解對於書中名物，因為缺少訓詁考據（朱子非無訓詁，清末潘衍桐撰朱子論語集註訓詁考二卷，證明朱子解經，並不廢訓詁），致所解或有繆誤，以致為清代學者們所糾彈。但重考據者不能明義理，一書動輒數十百萬言，讀了之後仍不能明瞭孔子的思想，此所以朱注傳世近八百年盛行不衰。然而朱子究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語文與思想觀念終與現代的人有所不同，而且宋代的道學家講學的氣息濃厚，幾個字的解釋，往往發揮出幾百言的大道理，難為現代人所接受，更何況還有若干解釋錯誤的地方。為了彌補這些缺憾，近人錢賓四先生乃撰論語新解，仿朱子集注的方法，而改正其錯誤，折衷調和後代學者改訂朱子注釋的紛紜異說，用淺近的語文而作新解，每句繫以解說，每章後總括其大意，並用語體文翻譯出，使人讀了親切有味，容易體會。此書可以說是將流傳兩千多年的論語，在釋注方面作了一個總結。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Lun Yü*

Peter Cha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the long course of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no single work has been more widely appreciated or more extensively commented than *Lun Yü*.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 in China is, to be sure, predominant and incomparable. For centuries the Confucian teaching delineated therein has also been respected and adopted by Japan, Korea, and many other east Asian nations where Chinese culture i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the makeup of civilization. Its circulation through the ages, however, has inevitably brought forth a host of variations on the text itself, which, coupled with the intellectual and philosophical trends of the periods following its emergence, have made the Confucian classic susceptible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e are therefore left with various copies of the text, as well as numerous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work.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hen, is to trace, in a bibliographical sense, the evolution of *Lun Yü*. Existing versions of the work, both annotated and non-annotated, will be grouped into four categories: Collectanea of lost or incomplete editions, Copies of the *Lun Yü* proper,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and Works of Japa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Ch'ien Mu's *Lun Yü Hsin Chieh* as the definitive reading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i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Lun Yü* 論語

Lun Yü Hsin Chien 論語新解

Bibliographical 版本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Chao-ling Sung.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一四一 through 一五二.